

研究論文

高等教育成就的族群差異： 學費補貼、職業情境、與世代差異

吳乃德

吳乃德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感謝本刊兩位評審，其中一位建議本文同時也將新的世代列入分析。讀者不難從本文中發現，他的建議讓本研究更為豐富。此外，感謝林雪芳小姐在資料處理上的辛苦協助，以及徐火炎教授在統計方法的諮商。錯誤當然是我自己的。本研究使用的資料來自國科會資助的研究《臺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調查期間是1999年，計畫編號NSC88-2412-H-001-012。收稿日期：2012/2/2，接受刊登：2013/2/4。

中文摘要

外省籍民衆的經濟社會地位明顯高於本省籍民衆，這項族群差異一直受到研究者的注意。由於教育成就是影響社會經濟地位最重要的因素，解釋外省籍民衆的高教育成就乃成爲學者研究的重點。過去學界對此議題的研究，曾大致相同的結論：因父母集中任職於軍公教部門而獲得的學費補貼，是外省籍民衆高等教育成就顯著高於其他族群的原因之一。范雲和張晉芬的研究以新的資料爲基礎，以不同的發現挑戰了這個傳統的智慧。

然而兩位作者的研究有兩個值得討論的地方。第一，它忽視快速經濟發展而導致的世代差異。臺灣在70年代之後因爲經濟繁榮帶來國民所得的快速提高，使得大學學費對中低收入的家庭，不再是沈重的負擔；軍公教家庭的學費補貼因此也失去原有的優勢。學費補貼對教育成就產生的優勢，因此應比較顯著地作用於高年齡層世代上。第二，兩位作者的研究將本省籍和外省籍樣本分開分析，因此偏離了這個議題原本的問題意識：外省籍民衆之教育成就高於本省籍民衆是否來自學費補貼？兩位的研究因此未能賦予這個重要議題結論性的發現。

本研究使用范、張研究的同一筆資料，將世代差異列入分析，同時也將兩個族群合併分析，以評估學費補貼是否讓外省籍民衆在教育上具有優勢。研究發現：學費補貼確實讓外省籍民衆的高等教育具有優勢；這項優勢在高年齡層世代上，更爲顯著。同時，如同先前研究所指出的，學費補貼並非單一的因素；軍公教的職業情境應也是重要的因素。

關鍵詞：代間流動、教育成就、世代差異、學費補貼、軍公教補助、族群政治、社會經濟地位

**Ethnic Differences in Higher Education Attainment:
Generation, Tuition Subsidies and Public Sector Employment**

Nai-teh WU

Institute of Sociology, Academia Sinica

Abstract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between Chinese mainlanders and native Taiwanese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groups in term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in Taiwan. For many years it was assumed by many local scholars that differences in educational attainment were largely due to tuition subsidies for the children of government employees—a sector dominated by Chinese mainlanders. This assumption was challenged by two researchers using new data on tuition subsidies gathered through a national survey. Their research however has overlooked the social change effect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ir statistical models failed to tackle the core question of whether high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mong Chinese mainlanders can be ascribed to tuition subsidies. This paper uses the same above-mentioned data to confirm the conventional wisdom: subsidies to the children of government employee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higher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mong Chinese mainlanders prior to the period of intens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aiwan. This advantage was significantly reduced, but not eliminated, in the later stage when college tuition was relatively affordable to the families with lower incomes. The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arental employment in the public

sector has also steadily decreased.

Keywords: Social Economic Status (SES), Tuition Subsidy, Public Sector Employment, Ethnic Politic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Class Mobility

一、前言

教育可以稱為社會學的黃金變項，足以解釋許多社會態度和社會行爲（Svallfors 2006）。對社會科學者而言，教育最大的重要性或許來自它對社會經濟地位的貢獻。社會經濟地位又決定了個人對社會資源的占有、生活的滿足和享受、消費休閒方式及文化品味。社會經濟地位和父母的教育成就也共同決定家庭關係和子女教養方式，以及因此導致的子女成就機會；相較於勞工階級的「自然成長」養育方式，中產階級家庭的「協同式開化」對子女才藝、發展、和社交技巧的開發、鼓勵、和重視，讓其子女處於起跑點的優勢（Lareau 2003）。甚至人的健康和壽命都受其社會經濟地位（或階級地位）的影響；健康的差異並非如一般人預期地只存在於最富有和最貧窮的階級中，而是每一層級都比其下階級來得健康（Robert and House 2000: 117）。

在現代社會中，社會經濟地位——或階級地位最重要的決定因素則為教育成就。國際社會學會中以「階層與流動」為研究目標的「RC28 小組」，其多國成員經過四十多年對不同國家之地位取得的研究，其共同發現之一即是：雖然教育幫助父代的社會經濟地位在子代中複製；可是教育同時也促進了社會經濟地位的流動性，讓社會經濟地位處於相對不利的子代，可以透過教育而往上流動（Hout and DiPrete 2006）。也就是說，在現代社會中，教育同時具有鞏固階級地位和促進階級流動的對立功能。教育對階級流動的促進功能，應是受惠於工業化國家高等教育的大量擴充。如果扣除教育機會擴充的因素，則中下階級子女相對於上層階級的子女，其接受高等教育的不利處境，半世紀來其實沒有太大改變，唯一的例外似乎是瑞典（Erickson and Jonsson 1996; Goldthorpe 2007: 45）。以英國為例，在2002年勞工階級的家庭中有15%的子女上

大學，而專業人士家庭的子女上大學的比例則為81%（摘自Barry 2005: 62）。雖然教育是延續社會不平等的重要機制，然而卻也是中下階層子女往上爬升的重要途徑。

由於教育對階級流動的重要影響，教育成就成為社會科學重要的研究議題。教育成就、階級分析、階級流動等議題，應該是社會科學研究中和「社會正義」——政治哲學的重要價值，最為直接相關者（吳乃德 1997: 140-41）。這也是它們持續獲得許多社會學者關心的原因之一。研究臺灣的社會學者很早就注意到，不同族群背景的民衆在社會經濟地位上有明顯的差異：外省民衆居於高社會經濟地位的比例，顯著高於本省民衆（蔡淑鈴 1988；吳乃德 1997；王宏仁 1999）。最早注意到這個現象的是美國的社會學者Hill Gates（1981），之後臺灣社會學者的研究也以更豐富、更堅實的資料支持了這個觀察。由於教育成就對社會經濟地位的重要影響，分析臺灣教育成就的族群差異，乃成為解釋族群社會經濟地位取得、以及階級流動之差異的最重要工作。而這些研究同時也描述了臺灣威權時期族群政治之部分圖像。

臺灣社會學者、經濟學者、和政治學者對此議題的研究，曾有大致相同的結論：外省籍民衆因父母集中任職於軍公教部門而獲得的學費補貼，是其高等教育成就顯著高於其他族群的原因之一。最近范雲和張晉芬的研究（2010）以新的資料為基礎，挑戰了這個傳統的智慧，非常值得注意。可惜的是，其研究有兩個值得保留的地方。

第一，兩位作者忽視了一般學者都會注意到的重要因素：世代差異。暫時不談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因為政權轉移所造成的歷史記憶、文化認同、以及政治支持而產生的世代差異現象。過去五十年，臺灣快速的經濟發展和工業化帶來巨大且快速的社會變遷；這個快速的社會變遷，讓不同世代的民衆處於完全不同的生命情境和政治社會環境中；不

同的世代因此也發展出不同的政治和社會態度。研究臺灣民衆的政治態度（如政黨支持、民族認同等），或社會態度（如族群認同、族群印象、族群通婚等），不將世代因素列入考慮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事實上，范、張兩位所挑戰的先前研究（參見下文對駱明慶 2001的回顧）也都注意到這項因素：社會變遷對教育成就以及經濟社會地位取得，在不同世代間具有明顯的差異。

在經濟相對匱乏的50、60年代，高等教育對中低收入的家庭是一個巨大的花費負擔；在這樣的階段中，軍公教部門對受僱者子女的學費補貼應該是一個優勢。隨著臺灣國民所得不斷提高，高等教育的花費不再是中低收入家庭的沈重負擔，軍公教部門的教育補貼或許也失去相對的優勢，不再成爲影響子女教育成就的重要因素。1974年臺灣公立和私立大學的平均學費各爲2,500元和9,150元；該年的平均國民所得是32,214元，收入最低十分位家庭的年可支配所得只有42,229元。大學教育，特別是私立大學，對中低收入的家庭顯然是沈重的負擔；這尚不包括就學子女在外地生活的費用。1990年的平均國民所得已經上升到205,105元，雖然大學學費這期間也跟著上漲（公立大學18,814元、私立大學56,702元）。然而國民所得提高的效果之一是：生活必須花費在家庭支出的比重中相對降低，可支配所得也相對提高；最低收入十分位家庭的支配所得從1974年的42,229元提升至1990年的160,003元（張清溪 1995: 420）。中低收入的家庭因此有更多的資源投資於子女的高等教育。因此，如果軍公教部門的學費補貼讓其子女具有高等教育的優勢，此優勢應該比較顯著地存在於臺灣經濟起飛之前，即戰後20年高等教育的適齡世代中。

范、張的研究另外一個可以討論的地方是，其將本省籍民衆與外省籍民衆分開分析。結果發現：學費補貼只在本省籍民衆當中有效果，接

受學費補貼的本省籍民衆比沒有接受補貼的本省籍民衆有較高的教育成就。教育補貼對外省籍民衆則沒有效果，獲得教育補貼的外省籍民衆，其教育成就並沒有比沒有接受補貼的外省籍民衆爲高。這個發現雖然有趣，卻偏離了此議題原本的問題意識：外省籍民衆比本省籍民衆普遍較高的教育成就，有多少程度上是來自於因爲父母任職於公教部門而獲得的學費補貼？因爲范、張的研究將兩個族群分開分析，他們的研究對這個重要議題的回答毫無幫助。

由於這兩個缺憾，范、張的研究仍然無法告訴我們，是否應該放棄我們原先的發現和理解。本文希望能給予這個重要議題較清楚的定論。

二、傳統的智慧及其挑戰

探討臺灣民衆社會經濟地位取得的省籍差異，社會學者蔡淑鈴是先驅（蔡淑鈴 1988; Tsai 1992）：這兩篇論文的分析都使用1984年的「社會變遷基本調查」的資料。前者指出：在中低年齡層的人口中，外省人的教育成就顯著高於本省人。後者進一步指出：1950年之後出生的外省第二代，不論在教育成就或社會經濟地位的取得上，都顯著高於同一世代的本省人。她在後一篇論文中推測，外省籍民衆的教育成就顯著高於本省籍民衆，原因可能來自國語在學校教育中的使用、都會區的居住、以及外省籍民衆所集中的軍公教部門對子女的學費補貼。她所提出的這幾個可能解釋，都成爲後來者的研究方向。

學費補貼有多重要呢？經濟學者張清溪以1990年的學費標準指出，該年公立大學平均學費爲9,401元，而私立大學的平均學費則爲 28,351元。軍公教部門教育補助的額度，對公立大學是學雜費的80%，私立大學則爲學雜費的84.9%（張清溪 1995）。參考上文提及的家庭可支配所

得和學費的數字，此種對學費的高比例補貼，對外省籍中低收入家庭顯然無比重要，對其子女教育顯然比私部門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具有巨大的優勢。

然而，學費補貼的作用或許不只是花費的補助，同樣重要的是對教育動機的影響。蔡淑鈴在另一篇與瞿海源教授合寫的論文中，申論了軍公教部門的學費補貼對教育的重要作用：

即使是家境清寒者，也可以有起碼的保障，激發其教育抱負並有助於實際的教育取得。相對而言，勞工或農民的子弟…必須完全依賴家庭來負擔子女的教育成本。當家庭面臨經濟上的困難時，其子弟就有可能會被環境所迫，必須壓抑住個人的教育抱負或甚至退出升學的行列（蔡淑鈴、瞿海源 1992: 112）。

也就是說，學費補貼對教育成就的作用不只是物質的補助而已，同樣重要的是它對教育動機的重大影響。¹ 美國社會學界階層研究的發現之一，即是：家庭的社會經濟地位對子女教育成就的影響，部分是透過教育動機（Hallinan 1988: 253）。在最近出版的論文中，蔡淑鈴繼續追查影響社會經濟地位取得的因素。她發現國語的使用有利於社會經濟地位的取得（Tsai 2010）。

¹ 我一位來自農村的朋友，小時候經常必須躲開父母偷偷唸書。有時不幸被父親抓到，甚至得忍受鞭打。他回憶說，父親經常一邊打他一邊罵：「我又沒有錢讓你讀書，你還讀什麼書！」然而這位朋友卻憑堅定的意志，終於接受大學教育。而正如讀者會料想到的，他念的是免學費、又有生活補貼的師範大學。如今他的兒子、女兒、和女婿都是史丹佛大學博士，最小的兒子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後、獲得加州理工學院的高額獎學金。看著他這一家人，我常想：不知有多少優秀的農村子弟因為缺乏他的堅強意志，而被埋沒。

經濟學者駱明慶使用1990「台閩地區戶口普查」，以及1979-1992「家庭收支調查」這兩筆龐大的資料，更細緻地分析影響高等教育成就的原因（駱明慶 2001: 139）。他的發現是：父親任職於公部門（這兩筆資料缺乏母親的職業背景），確實是影響高等教育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然而其重要性卻不如父母的教育程度，以及居住於都會區的影響力。他另外的重要發現是：第一，外省籍民衆在大學教育上相對於本省籍民衆的優勢，隨著新世代的出現正逐漸縮小中。第二，1970-74出生的世代，「父親在公部門工作」的影響已經不顯著。駱明慶的研究支持了我們對社會變遷效果的一般印象：軍公教補貼所造成的教育差距，因為經濟繁榮、所得提高而失去效果。

社會學者陳婉琪對學費補貼的效果之分析策略，則是從樣本中挑選來自中下階層家庭（父親為國中以下教育）者為分析對象。她發現：同樣是來自中低收入的家庭，父親工作於公部門確實能解釋出生於1940、1950年代之子女的教育成就，可是其影響力未達顯著水準（陳婉琪 2005）。也就是說，公部門的學費補貼對子女教育成就的影響力（雖然不甚顯著），只發生在1960和1970年代的高等教育適齡世代上。之後，學費補貼就失去了影響力。

吳乃德研究（1997）的主要目標是解釋本省族群和外省族群，在階級流動上所表現的不同樣態。他發現：第一，相對於本省籍民衆，外省籍民衆顯著高比例地集中於中、上階級。第二，外省籍民衆不論是出生於哪一個階級，都比同一階級的本省籍民衆有較大的機會往上流動，成為中、上階級，而教育成就則是造成此種差別現象的最重要因素。解釋族群在教育成就上的差距，於是成為解釋兩個族群階級流動之差異的重要方向。第三，影響外省籍民衆教育成就的兩個因素是：父親的教育成就、以及父親或母親在政府部門工作。影響本省籍民衆教育成就的因素

則是：性別、年齡、父親的教育成就、和父親或母親在政府部門工作。不論是本省或外省族群，父親或母親在政府部門工作都成爲影響子女教育成就的重要因素。其研究再一次支持了蔡淑鈴、瞿海源等前人的發現。

然而父母親在公部門工作，子女並不必然就獲得學費補貼。正如吳乃德在該文中指出的，其研究只證實了「『公部門家庭』和『子女教育成就』的顯著相關。並沒有證實：這個相關是來自於『教育補貼』。」（吳乃德 1997: 164）駱明慶也指出，「幾乎所有的研究……均以軍公教就業身分的虛擬變數來代表教育補助費……但是軍公教的就業身分所衡量的，可能不僅是教育補助費的效果」，它還包括父親的偏好、對升學細節較爲明瞭、以及較高的社會資本（駱明慶 2001: 121）。范雲和張晉芬也指出，軍公教部門的受僱者具有穩定的工作，子女的教育比較不會因家庭經濟情況不穩定而無法升學或被迫輟學。此外，學歷也是進入公部門的重要條件之一：在公部門工作的父親一般而言具有較高的教育程度，其對子女的教育應有更高的期望。這些因素都可能導致公部門家庭的子女有較高的教育成就（范雲、張晉芬 2010: 273）。因此，公部門家庭子女有較高的教育成就，並不一定是因爲教育補貼的結果，而可能是因爲該部門職業特性及父親教育的程度。可是過去由於缺乏學費補貼的確實資訊，我們無法得知公部門家庭子女較高的教育成就，是來自公部門的職業特性，還是來自於學費補貼。

因此在本文作者參與的1999年「臺灣族群關係的社會基礎調查」中，我建議在問卷中加入「是否接受學費補貼」的題目，以便讓我們對這個重要議題能有確切的結論。范雲和張晉芬的研究即是使用這個調查的資料，以及這個題目所提供的資訊。他們的研究發現：教育補貼在外省族群和客家群族內部，對教育成就都沒有顯著的效果。兩位作者因此

認為，過去的研究者以教育補貼來解釋外省族群較高的教育成就，是「錯誤的歸因」（范雲、張晉芬 2010: 285-86）。其實，如上所述，先前的研究者對這個資料上的限制並非沒有認知。不過，范張兩位作者的發現和結論，仍然對流傳許多年的傳統智慧（或更正確地說，傳統假設）提出挑戰，仍然非常值得我們注意。可是由於他們的研究除了將外省籍和本省籍民衆分開分析，因而偏離原本的問題意識外，也因忽略了臺灣巨大的社會變遷而沒有考慮到世代差異，其研究因此未能為流傳多年的假設提供結論性的發現。如今我們已經獲得學費補貼的資訊，如果將世代差異列入分析，結果是否將有所不同？傳統的假設是否會被揚棄，還是更為完整地、更具結論性地被證實？本文使用兩位作者所使用的相同問卷調查資料，同樣以受訪者是否接受學費補貼的資訊為主要分析基礎，然而卻將社會變遷的效果（世代變項）放入分析中。我們也援用一般的統計方式，將本省籍和外省籍樣本放在同一個統計模型中分析，以了解學費補貼在多大的程度上解釋了外省籍民衆較高的教育成就。

三、教育成就的世代差異

臺灣由於快速的經濟發展以及政府對教育的投資，教育普及率在短短一個世代獲得巨大的成長。本文使用的問卷調查樣本，也反映出這個重要現象。如表1所示，整體而言，本省族群和外省族群在教育成就上有巨大的差距：本省人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是26.9%，而外省人則是50.9%。然而這個顯著差距主要是較高幾個年齡層巨大差距所造成的效果。50歲以上（出生於1949年之前）的本省人中，受過高等教育的比例只有7.1%。而相同年齡層的外省人則有34.3%受過高等教育，比例是同

年齡層本省人的將近五倍。然而隨著教育的普及，雙方的差距逐漸縮小。在最低的年齡層（29歲以下）中，本省人有超過一半（51.7%）的人接受高等教育；而外省族群則是58.0%。族群的教育成就差距顯著地隨著社會變遷而減小。從1949年開始經過二十年之後所出生的世代，族群之間的教育成就差距幾乎不復可見。

表1 族群、年齡、與教育成就，1999 %(N)

	本省				外省			
	初中 以下	高中 高職	大專 以上	總數	初中 以下	高中 高職	大專 以上	總數
29 歲以下	8.2 (55)	40.1 (270)	51.7 (348)	100 (673)	6.0 (6)	36.0 (36)	58.0 (58)	100 (100)
30-39 歲	28.5 (217)	40.2 (306)	31.3 (238)	100 (761)	10.8 (15)	36.0 (50)	53.2 (74)	100 (139)
40-49 歲	51.4 (415)	27.7 (224)	20.9 (169)	100 (808)	10.2 (13)	34.4 (44)	55.5 (71)	100 (128)
50 歲以上	82.2 (634)	10.6 (82)	7.1 (55)	100 (771)	42.3 (41)	23.7 (23)	34.0 (33)	100 (97)
總數	43.8 (1,321)	29.3 (882)	26.9 (810)	100 (3,013)	16.2 (75)	33.0 (153)	50.9 (236)	100 (464)

如前引文獻所述，教育一方面是上層階級複製其階級地位的重要工具；許多研究所發現的兩代教育成就之間的高度相關性，正顯現這種階級複製現象。然而另一方面，教育的普及也讓中下階級的子女得以往上流動。如表2所示，無論是本省族群或外省族群，父代的教育成就都和子女的教育成就顯著相關。而且，其顯著性在兩個族群中都幾乎相同。具有高等教育成就的本省人，其子女有74.6%接受高等教育；而外省族群則是75.0%。高中教育程度的本省父親中，30.8%的子女有高中教育程度，60.7%有大學教育；同樣是高中教育程度的外省父親，其子女接受高中教育和大學教育的比例分別是32.2%和62.2%。兩個族群幾乎沒有差

別。比較大的差別來自低教育程度的父代。

另一方面，表2也顯示了教育普及所產生的階級流動效果。初中教育程度的本省籍父代中，有21.1%其子女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由於其高等教育成就，其階級地位多為中、上階級。來自外省族群低階級地位（低教育程度）家庭的子女，亦有相當的機會獲得高等教育，往上流動。可是相較於其他的教育程度層，最低教育程度層的父代中，其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及往上流動的機會，本省籍和外省籍有著顯著的差異（本省的21.1%對比外省的35.5%）。為什麼父代教育對子女教育成就的影響，兩個族群間只有在低教育層的父代有所差異？為什麼族群間向上流動的差異，只出現在來自最低教育成就（最低階級地位）的家庭？我們懷疑，這應為軍公教學費補貼所造成的影響。

表2 族群與代間流動（教育成就），1999 %(N)

		本省				外省			
		子代教育				子代教育			
		初中 以下	高中 高職	大專 以上	總數	初中 以下	高中 高職	大專 以上	總數
父 代 教 育	初中以下	48.7 (1,208)	30.2 (749)	21.1 (522)	100 (2479)	24.6 (56)	39.9 (91)	35.5 (81)	100 (228)
	高中高職	8.5 (25)	30.8 (91)	60.7 (179)	100 (295)	5.6 (5)	32.2 (29)	62.2 (56)	100 (90)
	大專以上	6.0 (8)	19.4 (26)	74.6 (100)	100 (134)	4.0 (5)	21.0 (26)	75.0 (93)	100 (124)
	總數	42.7 (1241)	29.8 (866)	27.5 (801)	100 (2,908)	14.9 (66)	33.0 (146)	52.0 (230)	100 (442)

由於本文強調社會變遷可能影響族群間教育成就的差異，在更進一步分析之前，我們先考察階級複製／階級流動在不同世代的差異。表3是將表2資料細分為不同世代的結果。表3揭露出表2所隱藏的因經濟發展所造成的趨勢和變遷。其中最顯著的現象是：低教育程度（低社會階

表3 族群與代間流動，1999

		子代教育						父代教育	
		本省			外省				
		初中以下	高中高職	大專以上	總數	初中以下	高中高職	大專以上	總數
29歲 以下	初中以下	11.0(51)	45.7(211)	43.3(200)	100(462)	11.4(5)	50.0(22)	38.6(17)	100(44)
	高中高職	0.8(1)	30.9(38)	68.3(84)	100(123)	0.0(0)	18.2(4)	81.8(18)	100(22)
	大專以上	0.0(0)	17.6(13)	82.4(61)	100(74)	3.2(1)	22.6(7)	74.2(23)	100(31)
30-39	初中以下	31.9(202)	42.9(272)	25.2(160)	100(634)	14.5(9)	50.0(31)	35.5(22)	100(62)
	高中高職	5.1(4)	29.5(23)	65.4(51)	100(78)	6.3(2)	40.6(13)	53.1(17)	100(32)
	大專以上	3.2(1)	16.1(5)	80.6(25)	100(31)	2.7(1)	10.8(4)	86.5(32)	100(37)
40-49	初中以下	54.6(383)	27.5(193)	17.9(126)	100(702)	17.5(10)	38.6(22)	43.9(25)	100(57)
	高中高職	18.3(13)	33.8(24)	47.9(34)	100(71)	10.3(3)	31.0(9)	58.6(17)	100(29)
	大專以上	23.5(4)	29.4(5)	47.1(8)	100(17)	0.0(0)	28.9(11)	71.1(27)	100(38)
50歲 以上	初中以下	84.1(572)	10.6(72)	5.3(36)	100(680)	49.2(32)	24.6(16)	26.2(17)	100(65)
	高中高職	30.4(7)	26.1(6)	43.5(10)	100(23)	0.0(0)	42.9(3)	57.1(4)	100(7)
	大專以上	25.0(3)	25.0(3)	50.0(6)	100(12)	16.7(3)	22.2(4)	61.1(11)	100(18)
總數		42.7(1241)	29.8(865)	27.6(801)	100(2907)	14.9(66)	33.0(146)	52.0(230)	100(442)

父代教育

級)的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往上流動的機會在不同的世代具有的巨大差異。出生於1949年之前的本省籍民衆,如果是來自低教育程度的父代(低社會階層的家庭),則其接受高等教育、往上階級流動的機會非常微小(5.3%)。來自同樣家庭而出生於1950至1959之間者,其接受高等教育、往上流動的機會則大為增加。而出生於1970年之後、在1988之後為大學教育適齡者的最低年齡層,來自最低社會階層家庭的子女,已經高達43.3%的比例有機會接受高等教育。二、三十年的經濟發展和教育擴充所帶來的變化,不可謂不大。

然而對本文的目標而言,最重要的還是經濟發展和教育擴充對族群教育成就差距的影響。如表3所示,出生於1949年之前的高年齡層中,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有巨大的差距。父親是最低教育程度者中,本省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微乎其微(5.3%);相對而言,同樣家庭的外省子女,卻有26.2%的機會接受高等教育。這個巨大的差距在兩個次低年齡層(40-49歲和30-39歲)中,逐漸縮小(17.9%對43.9%;25.2%對35.5%)。一直到最低年齡層(29歲以下,出生於1970之後)中,差距已經不復可見;1970年代後,父親為低教育程度的本省家庭子女,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甚至略高於同樣父親教育程度的外省族群(43.3%比38.6%)。

以上幾個表格所列的數字都清楚顯示,經濟發展和教育擴充對族群教育機會差距所帶來的影響:不但不同族群間教育成就的差距消失,中低階層家庭子女往上流動的族群差距也消失。在這個教育機會從族群間具有巨大差距到完全消弭的趨勢中,父代於軍公教部門就業所帶來的優勢(不論是職業情境優勢或教育補貼),對子代的教育成就必然失去原先的影響力。這應該是一個合理的假設。表4的數字似乎也支持了這樣的預期。父代在公部門與私部門任職對子女教育成就,最大的影響是對

表4 公/私部門與代間流動，1999 %(N)

父 代 教 育	年 齡	子代教育							
		公部門*			私部門**				
		初中以下	高中高職	大專以上	總數	初中以下	高中高職	大專以上	總數
20-29	初中以下	1.9(2)	13.9(15)	14.8(16)	100(41)	11.4(52)	46.0(210)	42.7(195)	100(457)
	高中高職	0.0(0)	25.0(9)	75.0(27)	100(36)	0.9(1)	28.73(33)	70.4(75)	100(115)
	大專以上	1.8(1)	14.0(8)	84.2(48)	100(57)	3.6(2)	23.2(13)	73.2(41)	100(56)
30-39	初中以下	21.9(14)	39.1(25)	39.1(25)	100(64)	29.7(186)	44.3(278)	26.0(163)	100(627)
	高中高職	8.7(4)	37.0(17)	54.3(25)	100(46)	2.8(2)	28.2(20)	69.0(49)	100(71)
	大專以上	4.7(2)	14.0(6)	81.4(35)	100(43)	0.0(0)	16.0(4)	84.0(21)	100(25)
40-49	初中以下	22.0(18)	35.4(29)	42.7(35)	100(82)	54.7(361)	27.4(181)	17.9(118)	100(660)
	高中高職	7.1(3)	26.2(11)	66.7(28)	100(42)	20.8(11)	32.1(17)	47.2(25)	100(53)
	大專以上	6.5(2)	22.6(7)	71.0(22)	100(31)	4.3(1)	43.5(10)	52.2(12)	100(23)
50歲 以上	初中以下	63.5(40)	22.2(14)	14.3(9)	100(63)	82.2(523)	11.3(72)	6.4(41)	100(636)
	高中高職	16.7(3)	33.3(6)	50.0(9)	100(18)	40.0(4)	20.0(2)	40.0(4)	100(10)
	大專以上	13.3(2)	20.0(3)	66.7(10)	100(15)	30.0(3)	20.0(2)	50.0(5)	100(10)
總數		17.3(93)	28.3(152)	54.5(293)	100(538)	41.8(1146)	30.7(842)	27.5(755)	100(2743)

* 父母親任職政府機構者。

** 包含父母親任職公營企業者。

1949年之前出生的世代。在這個世代中，父代在公部門而為低教育程度者中，有14.3%的子代具有高教育成就；而私部門中則只有6.5%。在次高年齡層（40-49歲）中，公部門的低教育程度父代有42.2%的子女獲得高教育機會；而私部門則只有17.7%。然而這項差距在29歲以下的最低年齡層中，就變得非常微小（48.8%對比42.4%）。公私部門子女教育成就的差距由顯著至消失，同樣發生於高教育的父代中。表4清楚地顯示，公部門任職對子女的教育成就所具有的優勢，比較顯著地發生在較高的年齡層中。

然而，父代在公部門任職並不一定獲得學費補貼。表4所顯示的公部門任職對子女教育的優勢，可能並非來自學費補貼，而是職業情境，例如安定的工作、更多時間和餘暇督促子女的課業、子女免於家庭勞務等。為了初步釐清「公部門子女的教育優勢」是否來自學費補貼，我們選擇樣本中父親或母親任職於公部門的受訪者作為分析對象。然後我們比較其中「獲得學費補貼者」和「沒有學費補貼者」之教育成就。這樣的比較或能初步了解上述較高年齡層中巨大的「公部門效應」，是否來自教育補貼，還是來自公部門的職業情境。

如表5所示，來自政府部門具有同樣職業情境的家庭子女，是否接受軍公教學費補貼和高等教育成就具有顯著的相關性。而且這樣的相關性並不因世代的差異而有所不同。因為50歲以上有接受軍公教學費補貼的個案數目過少，暫時不予分析。40到49歲的年齡層中，同樣來自軍公教部門的家庭，父親是低教育程度而又沒有學費補貼者，子女具有高等教育成就的比例是30.2%；同樣低教育程度的父親可是卻有學費補貼者，子女具有高教育成就的比例則是65.5%。兩者的差距頗為巨大。同樣來自軍公教的部門可是沒有學費補貼者，高教育程度父親的子女中只有57.1%具有高教育成就；相對而言，獲得學費補貼者則有高達82.4%的

表5 公部門之學費補貼與子女教育成就，1999* % (N)

父 代 教 育	年 齡	子 代 教 育							
		有 補 助			無 補 助				
		初 中 以 下	高 中 高 職	大 專 以 上	總 數	初 中 以 下	高 中 高 職	大 專 以 上	總 數
20-29	初中以下 高中高職 大專以上	-- -- --	33.3(3) 9.1(1) 10.3(3)	66.7(6) 90.9(10) 89.7(26)	100(9) 100(11) 100(29)	8.3(2) 0(0) 0(0)	50.0(12) 43.8(7) 21.1(4)	41.7(10) 56.3(9) 78.9(1530)	100(24) 100(16) 100(19)
30-39	初中以下 高中高職 大專以上	14.3(1) 5.9(1) 0(0)	14.3(1) 35.3(6) 9.5(2)	71.4(5) 58.8(10) 90.5(19)	100(7) 100(17) 100(21)	28.2(11) 15.0(3) 10.0(2)	43.6(17) 45.0(9) 15.0(3)	28.2(11) 40.0(8) 75.0(15)	100(39) 100(20) 100(20)
40-49	初中以下 高中高職 大專以上	8.0(2) 0(0) 0(0)	24.0(6) 33.3(6) 17.6(3)	68.0(17) 66.7(12) 82.4(14)	100(25) 100(18) 100(17)	20.0(6) 10.5(2) 18.2(2)	46.7(14) 21.1(4) 27.3(3)	33.3(10) 68.4(13) 54.5(6)	100(30) 100(19) 100(11)
50歲	初中以下 高中高職 大專以上	100.0(3) 33.3(1) 0(0)	0(0) 0(0) 50.0(1)	0(0) 66.7(2) 50.0(1)	100(3) 100(3) 100(2)	56.1(23) 14.3(2) 8.3(1)	26.8(11) 42.9(6) 16.7(2)	17.1(7) 42.9(6) 75.0(9)	100(41) 100(14) 100(12)
總數		4.9(8)	19.8(32)	75.3(122)	100(162)	20.4(54)	34.7(92)	44.9(119)	100(265)

* 分析對象為父母親任職政府機構者，不包含任職公營企業者。

子女具有高教育成就。獲得學費補貼者和沒有補貼者之間的顯著差異，同樣出現在兩個較低的年齡層中。表5的數字清楚地、也一致性地顯示，在政府部門任職的家庭中，學費補貼和子女教育成就之間的顯著相關性。

雖然學費補貼和教育成就的相關性非常顯著，而且也一致地出現在所有年齡層中，然而這樣的相關性是否來自其他因素的影響，例如城鄉的差距？過去許多研究一直將城鄉差距列為影響教育成就的可能因素之一。相較於鄉村地區，都會確實提供比較豐富的教育資源，如較好的中學、書店和補習班的存在，和來自較高文化資源家庭的同學相處而產生的學習動機，因文化活動（如電影院、展覽、音樂會、演講等）之刺激而更早的啟蒙。由於外省籍民衆大多集中居住於都會地區，我過去也曾經假設，城鄉差距或許能解釋為何在控制所有相關變數之後，外省籍民衆仍然比本省籍民衆具有較高的教育成就（吳乃德 1997: 162）。如果獲得學費補貼的軍公教家庭都集中居住於都會區（一個不太合理的假設），表5所顯示的學費補貼效果或可能只是城鄉差距的反映，而非來自學費補貼。

除了城鄉差距之外，另外一個可能讓學費補貼和教育成就成爲虛假相關的因素是兄弟姊妹的數目。在經濟匱乏的年代中，中低收入家庭的教育策略是僅讓部分的子女（通常是兒子）接受高等教育。因此，中低收入的家庭中兄弟姊妹數目較少的人，有較高的機會接受高等教育。本文的資料分析也顯示了這樣的現象（詳下文）。如果接受學費補貼的軍公教家庭都有較少的子女數（同樣不太合理的假設），則上面所發現的學費補貼和教育成就的相關性，也可能只是虛假的關係。

無論如何，爲了了解學費補貼和教育成就之間的關係，我們必須以統計多元迴歸模型來分析，在其他變項控制之後分析學費補貼對教育成

就的獨立貢獻。如本文一直所強調的，學費補貼如果對教育成就有所影響的話，這個影響應該比較顯著地發生在經濟相對匱乏、學費負擔對中低收入家庭頗為沈重的50和60年代。而上文（表3、表4）的資料也顯示，在70和80年代為高等教育學齡的最年輕世代中，不論是族群背景、或父代是否任職於公部門，都已經不影響教育成就了。因此，本文的統計迴歸模型將樣本中的不同世代分開分析。² 一個模型選擇50及60年代為大專教育的學齡層、即介於40-67歲之間的高齡受訪者。另一個模型則選擇40歲以下的年輕世代為樣本。同時，為了更細緻地釐清影響教育成就的因素，兩個統計模型中都包含兩個不同的迴歸依變項：大專教育成就、和中學教育成就。前者試圖了解高等教育成就的貢獻因素；後者（剔除高等教育成就者）試圖了解影響中等教育成就和低教育程度的差別因素。

比較以不同世代樣本為分析對象的這兩個多元迴歸模型（表6和表7），我們發現幾個有趣的現象。第一，過去一般所認為的城鄉差距因素，只能解釋年輕世代的高等教育成就。對年長的世代而言，學齡階段（15歲以前）居住於都會區在高等教育成就並不具有優勢。這和過去的研究發現有所不同。駱明慶的研究以大規模的人口普查資料為分析基礎，發現居住於都會區是解釋（本省籍民衆）高等教育成就的重要因素（駱明慶 2001: 135）。如今的不同發現，或許同樣來自社會變遷的效果。駱明慶所使用的資料是1979-1992的「家庭收支調查」，分析對象則是18-19歲的子女。其高等教育的學齡階段是1979-1992的13年間；而第一個模型分析的對象，則是在1957-1977處於高等教育的學齡。這是兩個相當不同的經濟發展階段。在經濟發展的早期，都市化尚未顯著；

² 感謝評審提醒以相同的模型分析新的世代；這個重要的提醒讓本研究增加許多重要的發現。

表6 預測教育成就邏輯回歸模型（40-67歲）

	大專以上		高中職教育	
	b	S.E.	b	S.E.
性別（男）	.816	.153***	.312	.143*
省籍（外省）	.796	.221***	1.076	.274***
15歲以前居住地方（都會）	.365	.156	.958	.150***
父親教育程度（高中高職為比較組）				
初中以下	-1.348	.233***	-1.066	.322**
大專以上	-.030	.356	-.387	.628
兄弟姐妹數目（6個以上為比較組）				
0-2個	.363	.266	.239	.251
3-5個	.686	.169***	.317	.151*
父母親任職部門(軍公教等政府機構)	.593	.226**	.604	.265*
軍公教補助（領取）	.943	.306**	1.008	.502*
（常數）	-1.593	.279***	-.785	.340*
-2 Log likelihood	1184.540		1218.883	
Cox & Snell R ²	.167		.124	
Nagelkerke R ²	.264		.179	
有效樣本數	1453		1164	

* $p \leq 0.05$, ** $p \leq 0.01$, *** $p \leq 0.001$

城鄉的教育資源差距也不太大。我們如今所熟知的都會中的教育資源，如雙語幼稚園、週末科學營、才藝教室、誠品書店、何嘉仁美語等，當時都尚未出現。即使如此，那個時代都會區的中學確實也提供了高比例的大學生（參考駱明慶 2002）。如何解釋這個現象？可能的原因是：都會中學的學生並非全部居住於都會區；它們只是吸收了鄰近鄉鎮的優秀學童。³ 通學現象的存在以及都會文化的尚未興起，使得居住地區對年長世代的教育成就沒有顯著影響。不過，隨著經濟發展所帶來的都市

³ 我就讀台中一中的時候（1952-1958），同班同學有來自彰化、霧峰、豐原、后里、沙鹿、梧棲、大甲，甚至遠自南投、泰安、通霄等地。記憶中班上大約有五分之一的同學是「通學生」。每天全校的通學生放學之後必須排隊集體到火車站，其隊伍浩浩蕩蕩，頗為壯觀。台中女中也同樣有浩大壯觀的通學隊伍。

表7 預測教育成就邏輯回歸模型（39歲以下）

	大專以上		高中職教育	
	b	S.E.	b	S.E.
性別（男）	.154	.113	-.027	.155
省籍（外省）	-.313	.193	.303	.325
15歲以前居住地方（都會）	.558	.116***	.264	.174
父親教育程度（高中高職為比較組）				
初中以下	-1.197	.157***	-1.568	.422***
大專以上	.499	.254*	-.133	.739
兄弟姐妹數目（6個以上為比較組）				
0-2個	.900	.217***	1.152	.247***
3-5個	.498	.211*	.831	.217***
父母親任職部門（軍公教等政府機構）	-.054	.194	-.222	.313
軍公教補助（領取）	.973	.262***	-.109	.521
（常數）	-.360	.252	1.435	.463
-2 Log likelihood	1865.263a		1002.959b	
Cox & Snell R ²	.156		.067	
Nagelkerke R ²	.209		.095	
有效樣本數	1554		876	

*p ≤ 0.05, **p ≤ 0.01, ***p ≤ 0.001

化，居住地區對年輕世代的教育成就也產生顯著的影響。

城鄉差距和教育成就沒有顯著關連的第二個可能原因是，本文原先所觀察到的現象，只是其他更重要的變項的反映。本文在統計操作的過程中發現，城鄉差距對高等教育成就原先有顯著的解釋力。可是將兄弟姐妹的數目放進模型的時候，城鄉差距的解釋力就不顯著了。對資料作初步的檢查，我們也確實發現：兄弟姐妹的數目和教育成就有顯著的相關。有6位以上兄弟姐妹的受訪者，其獲得高等教育成就的比例偏低；而擁有6位以上兄弟姐妹者，較多居住於鄉村地區。

然而對我們目前研究任務最重要的是以下兩個發現。第一，就年長世代而言（於50、60年代為高等教育學齡世代），在控制了其他變項之後，軍公教部門的學費補貼和高教育成就，確實有顯著的相關性

($\text{significance}=.002$)，雖然其對中級教育和初級教育的差距沒有顯著相關。也就是說，軍公教部門的學費補貼對子女的教育成就之影響，只對高等教育成就產生作用。這頗為合理，因為花費最大的是高等教育，除了學費之外還有外地生活的費用。統計分析顯示的第二發現是，正如范雲和張晉芬所強調的，軍公教的職業情境對子女的高等教育成就有同樣顯著的影響力。軍公教家庭子女有較高的教育成就，很大原因是來自於其父母的職業情境。即使如此，就年長世代而言，軍公教部門的學費補貼對子女的高等教育成就，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影響力。過去許多研究者的發現，仍然受到實證資料的支持。

可是，隨著臺灣的經濟繁榮和所得的提高，高等教育對中低收入家庭的負擔也逐漸減輕的時候，學費補貼對高等教育成就是否也因此失去幫助的效果？表5顯示：年齡為20-29及30-39兩個最年輕的年齡層中，父代同樣任職於公部門、同樣教育程度的父親，獲得學費補貼者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仍然顯著高於沒有獲得學費補貼者。表7的迴歸模型也支持了這個關係；即使在高等教育花費已經相對減輕的世代中，軍公教人員的學費補貼仍然持續對其子女的高等教育發揮顯著的作用。有趣的是，在這個年輕世代中，軍公教父母的職業情境反而沒有顯著的幫助。這或許是因為經濟發展帶來中產階級的興起；中產階級的父母有較多的餘裕關注子女的教育。軍公教的職業情境對子女的高教育成就因此也失去優勢。

另外一個重要的議題、也是族群階級流動研究的原始問題意識是：外省籍民衆為何有較高的教育成就？軍公教部門的學費補貼在其中扮演多大的角色？我們可以從表6中看到，在控制所有其他變項（包括學費補貼）之後，省籍身分仍然有顯著的影響力；外省籍民衆比本省籍民衆在接受高等教育上有顯著的優勢。也就是說，學費補貼並非唯一的解釋

因素。事實上，在上一個研究中我們就有同樣的發現。當時提出的臆測是「移民效果」：第一代移民通常都比較注重子女的教育，因為這是他們在新社會中發展的唯一憑藉。美國的亞洲移民有同樣的現象（吳乃德 1997）。有趣、且重要的是，這個外省族群的優勢在新一代中已不復存在（表7）。

於此我們必須附帶說明：在范、張的統計分析中，依變項是「大學教育成就」，其研究試圖了解教育補貼對大學教育成就的影響。在本文的統計分析中，依變項則是「大專教育成就」，試圖分析教育補貼對大學和專科教育成就的影響。本文將專科與大學並列納入分析的主要原因是，在本文所著重分析的60、70年代中，專科教育對職業地位和階級流動的貢獻，雖遜於大學教育，卻和一般高中教育成就有顯著的差異。在那個年代中，專科教育和大學教育的差距並不若今日明顯。最顯著的例子為臺北工專，以及其他後來升格為大學的靜宜、實踐、淡江、及銘傳等。不過，爲了和范張研究做比較，本文也同時也用不包括專科的「大學教育成就」爲依變項，做了額外的分析。結果並沒有相差太多；如果將社會變遷的世代差異效果考慮進去，我們仍然發現：教育補貼對大學教育成就有顯著的影響（參見附錄）。⁴

四、結論

外省族群具有較高的教育成就，也因此具有較高的社會經濟地位；這是廣爲學者所注意的一個重要社會學和政治學現象。由於外省族群的就業集中於軍公教部門，過去許多學者在解釋外省族群高教育成就的時候，自然假設軍公教部門的學費補貼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尤其在經濟發

⁴ 感謝匿名評審提醒本文和范、張的研究在這項統計分析的差異。

展的前期和初期，大學教育（包括學費和外地生活費）對中低收入的家庭是一個巨大的負擔。相對於中低收入家庭，軍公教家庭高比例的學費補貼對子女的高等教育機會顯然是一個極大的優勢。

可是因為缺乏具體的實證資料，這個傳統的解釋一直存在假設的階段。相信軍公教學費補貼對子女教育成就有所幫助的研究者，並非沒有認識到以「軍公教部門就業」這個變項，來代替「學費補貼」並非完全妥當。過去研究所發現的「軍公教部門」的子女之高教育成就，並不一定、或至少不一定完全是學費補貼的效果。然而由於這個假設似乎言之成理，即使缺乏更詳細的實證資料，它仍然為許多人接受。如今我們終於有更詳細的資料可以驗證這項假設；雖然這些資料並不能完全反應真實的情況。⁵ 范雲和張晉芬兩位研究者以這些資料挑戰了這個被廣為接受的假設。可是由於他們的研究沒有考慮到臺灣因為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遷導致的世代差異，使得他們的分析並不完整，特別是結論不確定。由於其分析沒有分辨不同的世代，我們無法確知：對高年齡層發揮較大效果的學費補貼，其影響力是否因總體分析而被沖銷？

⁵ 本文所使用的問卷調查中關於是否接受「軍公教學費補貼」的資料，來自受訪者的回憶和認知。這和實際情況必然有所差距。本文撰寫過程中，作者參加研究所階段外省女同學女兒的婚禮；同學的四位姊妹也都出席了婚禮。同學的父親是中級軍官退伍，五位姊妹都接受高等教育，而且都留學美國、並在美國定居。我問同學在大學時代是否接受軍公教學費補貼，她的明確回答是「沒有，只拿過獎學金。」可是我分別詢問她的姊妹們，其回答卻是，「當然有！沒有免學費我們姊妹哪裡唸得起大學？」我的解釋是：許多軍公教父母以「成績不好無法獲得獎學金，就必須退學」為理由，來鼓勵子女的學業表現。導致許多人以為拿的是獎學金，而非學費補貼。我們當然無法得知，如此誤解的受訪者比例有多高。雖然接受軍公教學費補貼的案例，必然少於實際，不過我們也只能以資料為基礎來分析。

本研究將經濟發展導致的世代差異列入考慮，發現：在經濟匱乏、高等教育對中低收入家庭為巨大負擔的年代中，軍公教部門的教育補貼對子女的高等教育成就有顯著的幫助；同時，這個影響仍然持續至經濟已經繁榮、高等教育的花費負擔相對減輕的年代中。在兩個不同的世代中，學費補貼對高等教育成就都有顯著的影響力。然而，正如范、張的文章也指出的，學費補貼並非影響高等教育成就的唯一因素。軍公教的職業情境對其子女的高等教育成就也有重要的貢獻。有趣的是，或許是由於中產階級的興起，軍公教職業情境的優勢在新世代中以不復可見。

范、張研究的另一個值得保留的地方是：將外省籍民衆和本省籍民衆分開分析，以致於我們無法解釋臺灣一個重要的社會和政治現象：外省籍民衆普遍具有較高的教育成就和社會經濟地位，是否因為軍公教部門的學費補貼？如果是，學費補貼是否為唯一的因素？如今由於我們獲得了學費補貼的資訊，我們終於能對這個重要的問題給予較明確的答案：軍公教部門的學費補貼確實對外省籍民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有相當的貢獻，雖然它並非唯一的因素。

作者簡介

吳乃德，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現為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研究員。其近年研究興趣為民主轉型、民族認同、轉型正義等。

附錄 預測教育成就邏輯回歸模型（40-67歲）

	大學以上		高中職教育	
	b	S.E.	b	S.E.
性別（男）	.750	.191***	.312	.143*
省籍（外省）	.574	.260*	1.076	.274***
15歲以前居住地方（都會）	.363	.191	.958	.150***
父親教育程度（高中高職為比較組）				
初中以下	-.749	.279*	-1.066	.322**
大專以上	.476	.359	-.387	.628
兄弟姐妹數目（6個以上為比較組）				
0-2個	.238	.326	.239	.251
3-5個	.416	.213	.317	.151*
父母親任職部門（軍公教等政府機構）	.464	.265*	.604	.265*
軍公教補助（領取）	.643	.319*	1.008	.502*
（常數）	-2.684	.348***	-.785	.340*
-2 Log likelihood		848.851		1130.058
Cox & Snell R ²		.080		.145
Nagelkerke R ²		.164		.203
有效樣本數		1456		1041

* $p \leq 0.05$, ** $p \leq 0.01$, *** $p \leq 0.001$

參考書目

- 王宏仁，1999，〈「一九五〇年代的台灣階級結構與流動初探」〉。《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6(12月): 1-34。
- 吳乃德，1997，〈檳榔和脫鞋，西裝及皮鞋：台灣階級流動的族群差異及原因〉。《台灣社會學研究》1: 137-67。
- 范雲、張晉芬，2010，〈再探台灣高等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台灣社會研究季刊》79: 259-90。
- 張清溪，1995，〈九十年來的台灣學校教育〉。梁國樹編，《台灣經濟發展論文集》。台北：時報出版社。
- 陳婉琪，2005，〈族群、性別、與階級：再探教育成就的省籍差異〉。《台灣社會學》10: 1-40。
- 蔡淑鈴，1988，〈社會地位取得：山地、閩客及外省之比較〉。楊國樞、瞿海源編，《變遷中的台灣社會》。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 蔡淑鈴、瞿海源，1992，〈台灣教育階層化的變遷〉。《國家科學委員會研究彙刊》2(1): 98-118。
- 駱明慶，2001，〈教育成就的省籍與性別差異〉。《經濟論文叢刊》29(2): 117-152。
- ，2002，〈誰是台大學生？——性別、省籍與城鄉差距〉。《經濟論文叢刊》30(1): 113-147。
- Barry, Brian, 2005, *Why Social Justice Matter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Erickson, Robert and Jan O. Jonsson, 1996, *Can Education Be Equalized? The Swedish Cas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 Gates, Hill, 1981, "Ethnicity and Social Classes." in *The Anthropology of Taiwanese Society*, edited by Emily M. Ahern and H. Gat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thorpe, John H., 2007, "Explaining Educational Differentials," in *On Sociology*.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inan, M. T., 1988, "Equality of Educational Opportunity."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4: 249-68.
- Hout, Michael, and Thomas A. DiPrete, 2006, "What We Have Learned: RC28's Contributions to Knowledge about Social Stratification." *Research in Social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24: 1-20.
- Lareau, Annette, 2003, *Unequal Childhoods: Class, Race, and Family Lif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Robert Stephen A., and James S. House, 2000,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in Health: Integrating Individual-, Community-, and Societal-Level Theory and Research." in *Handbook of Social Studies in Health and Medicine*. edited by Gary L. Albrecht, Ray Fitzpatrick and Susan C. Scrimshaw.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 Svallfors, Stefan, 2006, *The Moral Economy of Class: Class and Attitudes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Tsai Shu-ling, 1992, "Social Change and Status Attainment in Taiwan: Comparisons of Ethnic Group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on Education and Society* vol. 2: 225-56.
- , 2010, "Language Skills and Status Attainment in Taiwan," *Journal of Language, Identity, and Education* 4(9): 229-49.